

[文章编号]1004—5856(2012)12—0001—14

近十年来中国高句丽民族历史问题 研究成果综述(2000—2012)

王禹浪 程 功 刘加明 郭丛丛

(大连大学 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 辽宁 大连 116622)

[摘 要] 中国对高句丽民族与历史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尤其是近十年,随着高句丽的文化遗产和历史问题日益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该领域在研究机构、人数、成果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因此,对近十年来中国高句丽研究史的回顾与总结,将会为这一领域的研究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文章按照研究高句丽历史问题的不同角度编辑整理了近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并深入探讨了我国在高句丽历史问题研究中已经取得的进展和尚存的不足。

[关键词] 近十年以来; 中国高句丽研究; 成果综述

[中图分类号] K312 **[文献标识码]** A

一、概述

高句丽是一支长期活跃于我国东北及东北亚大陆地域的古代民族,公元前37年在中国东北地区鸭绿江支流的浑江流域建国,后经三次迁都,最终迁往朝鲜半岛北部大同江流域的平壤城。公元668年高句丽政权被唐朝与新罗联军所灭亡,国祚长达七百多年。这是当时在中国东北地区和东北亚大陆的古代民族所建立的一个跨越时间较长的区域民族政权。高句丽政权的存在对中原王朝和东(北)亚众多的古代民族,及其建立的许多政权的存亡与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高句丽最初是以秽貊族系为中心建立政权,后来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入(同化与融化)东北亚地区的其他古族而演变壮大,最终在民族政权的迁徙过程中实现了民

族名称与政权称谓相互统一的自我认同的概念——高句丽。尤其是东汉时期王莽将高句丽称谓改称为“下句丽”后,高句丽人的这种恢复自我称谓的意识更加强烈。目前,有关高句丽政权及其高句丽民族的研究在东北亚地域的各国史观中有着不同的认识和解释。本文梳理了近十年来中国对这一历史问题的研究概况,按照研究高句丽历史问题的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编辑和整理,深入探讨了我国在高句丽历史问题研究中取得的进展情况以及尚存在的不足。

众所周知,自20世纪90年代中韩建交以来,东北亚区域古代民族历史的研究突然热闹起来,特别是有关高句丽民族历史的问题研究尤为突出。无论是研究成果、研究机构、参与研究的学者、学术会议、新闻媒体报道、文学体裁、考古调查和发掘等都较之以往有了较大的变

[收稿日期]2012-08-21

[作者简介] 王禹浪(1956-),男,大连大学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主要从事东北史与东北亚古代史研究;程 功(1987-),男,辽宁大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东北史研究;刘加明(1986-),男,黑龙江双鸭山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东北史研究;郭丛丛(1986-),女,济南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东北地方史、辽金史研究。

化,备受各国学术界关注,在国内外掀起了高句丽研究的热潮。特别是2004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我国苏州召开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大会上,将位于我国吉林省集安市和辽宁省桓仁县的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与朝鲜的高句丽墓葬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高句丽民族的历史研究日益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更加关注的热门话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对近十年来中国学者对高句丽古族的历史问题研究进行梳理和编辑,而对国际上对高句丽民族历史问题研究成果的梳理和编辑将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完成。

事实上,中国对高句丽民族与历史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尤其是近十年来,这个领域的研究机构、人数、成果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高峰。中国学者对高句丽遗迹在中国境内的大量发现、发掘与考古调查,为我们重新全面认识高句丽人的古代社会提供了可能,并为国际上研究高句丽民族历史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实证资料。因此,可以断定近十年来我国高句丽民族历史问题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并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经初步统计,近十年来有关于高句丽研究论文共367篇,其中族源、族属类29篇,政治类45篇,周边关系类33篇,历史地理类16篇,史料整理及研究与书评29篇,宗教与文化类86篇,考古类82篇,综述类20篇,其他27篇。关于高句丽研究的著作共63部,其中综合性质的历史研究类专著17部,考古类专著27部,史料整理及研究类专著5部,民族类专著5部,周边关系类专著2部,历史地理类专著1部,政治类专著2部,其他类专著4部。

二、近十年来中国高句丽研究重要成果综述^①(2000-2012)

进入21世纪后,中国高句丽史研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尤其是2004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位于我国吉林省集安市和辽宁省桓仁县的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使得这个并不为人所熟知的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开始受到世人瞩目。继而国内外的学术界对高句丽历史与民族及其相关的问题研究逐渐升温,并成为东北亚古代民族历史研

究的热点。

1. 关于高句丽族源、族属问题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高句丽民族的族源问题便争论不断。在近十年的高句丽历史问题的研究中,这个问题再次成为国内外学术界讨论和争议的重点。孙进己在《高句丽的起源及前高句丽文化的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2期)中认为,高句丽的族源应是由貊人、夷人、汉人多元族群组成。王绵厚的《高夷、濊貊与高句丽》(《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5期)和《高句丽起源的国内外代表性观点解析——再论高句丽族源主体为辽东“二江”和“二河”上游“貊”部说》(《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1期)等文章从考古学文化入手指出,高句丽族源主体为辽东“二江”(鸭绿江、浑江)和“二河”(太子河、苏子河)上游的“貊”部。杨军在《从“别种”看高句丽族源》(《东疆学刊》,2002年第1期)和《高句丽族属溯源》(《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2期)中提出,高句丽的族源是多元构成,包括秽人、貊人、句骊人、真番人和来自中原的汉人。刘子敏在《高句丽族源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5期)中认为,其最早的源头应是青铜时代的高夷,而高夷既不是秽族,也不是貊族。而秽貊和汉人也是高句丽重要的族源。此外,融入高句丽的还有沃沮、肃慎(挹娄)、鲜卑、契丹、百济、新罗等族。武玉环在《渤海与高句丽族属及归属问题探析》(《史学集刊》,2004年第2期)中认为,高句丽应属东北夷中貊族的一个支系。李德山的《再论高句丽民族的起源》(《东北史地》,2006年第3期)从文献记载、考古学文化以及高句丽的风俗习惯入手,再次阐述高句丽民族源于东夷之说。耿铁华在《高句丽民族起源与民族融合》(《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1期)中主要从高句丽与殷商民族的祖先神话传说、商人的五土方与高句丽的五部制以及考古学文化的关联入手,指出高句丽起源于殷商之族。

2. 关于高句丽归属问题的研究

自2002年“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启动以来,关于高句丽归属问题便成为了学术界的重要议题,这也是近十年来中国高句丽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倪军民、耿铁华、杨

春吉的《高句丽归属问题论稿》(《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从高句丽建国前中国东北行政管辖范围、高句丽民族历史与文化渊源出发,认为高句丽民族是中国东北的古代民族,高句丽国家是古代东北的民族政权。刘子敏在《走出高句丽历史研究的误区——试析古人在高句丽归属问题上的错误说法》(《东疆学刊》,2000年第1期)中认为,曾经主张高句丽是朝鲜古代国家,甚至将朝鲜半岛王氏高丽同高句丽混为一谈的观点,主要原因与一些古人的某些混乱记载以及某些错误说法的影响有着重要的关系。孙进己则在《当前研究高句丽归属的几个问题》(《东疆学刊》,2001年第3期)中就高句丽与中央皇朝的隶属关系以及高句丽的疆域来探讨其归属问题,并认为凡今天在中国疆界之内的历史上的政权和民族都属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范围,不管他当时是否隶属于中国中央政权,即使是独立的或隶属于他国的,只要是在今天中国疆界内,都应列入中国历史的研究范围,不管箕氏朝鲜、卫氏朝鲜、高句丽当时是否属朝鲜,但今天的朝鲜史也可以研究这些民族和政权,并将其写入朝鲜史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史两用完全是可以的。徐德源的《高句丽历史与疆域归属问题补议》(《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5期)从箕氏朝鲜和卫满朝鲜的归属来确定高句丽的归属问题,最后认为高句丽族自始就是在古代中国中央政权管辖之下活动的少数民族,高句丽王国最初是隶属于古代中国县级政权管辖的地方政权。马大正在《中国学者的高句丽归属研究评析》(《东北史地》,2004年第1期)中认为,当前高句丽归属问题的研究,需要继续扩大视野,一是对箕子朝鲜和卫氏朝鲜历史和活动地域的研究,二是开展中国古代疆域理论研究。在疆域理论的研究中,尤其应加强对宗藩关系和“羁縻”政策等课题的研究。苗威在《从金富轼的高句丽观看高句丽政权的性质及其历史归属》(《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4期)中认为,朝鲜半岛著名的史学家金富轼在其《三国史记》中虽然把高句丽与百济、新罗同列于“海东”三国,进行平行载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势之必然,在情理之中,但其高句丽观在“高句丽本纪”最后的论赞中得到了清晰准确的诠释:高句丽是中

国的割据政权。耿铁华在《高句丽遗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与高句丽历史归属问题》(《东北史地》,2004年第7期)中认为,中国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与朝鲜高句丽古墓群分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之后,高句丽历史归属问题研究面临新的挑战而展开研究。高句丽遗产是依照现代国界进行申报的,文物遗迹的归属与历史的归属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高句丽的历史归属应从其起源、建国直至灭亡的历史出发,充分研究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论证其臣属、朝贡、接受中原册封的情况。同时要搞清高句丽民族与国家生存活动的地域的历史归属。结论是,高句丽是中国东北的古代民族,高句丽王国是中国东北历史上的地方政权。孙玉良、孙文范在《高句丽向朝鲜半岛扩张始末》(《东北史地》,2004年第1期)中认为,高句丽人并非是朝鲜半岛的土著民族,对朝鲜半岛的领有,是其向外军事扩张、武力征服的结果。此一局面的形成,对于世居半岛的韩、濊族,以及以韩、濊族为主体而建立的新罗、百济而言,高句丽人纯属半岛的外来者。后来,随着高句丽政权的覆灭、民族的解体,高句丽在半岛上的势力最后消亡,乃至退出半岛历史舞台。因此,阐述朝鲜半岛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时,高句丽既不是创始者也不是后继者,只能算是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外来占领者,而且是局部占领,并未能成为整个半岛的主宰者。

3. 关于高句丽早期历史的研究

高句丽早期历史给人一种扑朔迷离之感,让人难辨真伪,因此,对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学术界也投入了较大的精力。朴灿奎在《王莽朝高句丽记事的诸史料辨析——王莽朝高句丽记事与高句丽侯驺考(上、下)》(《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第4期)中认为,王莽朝记事中的高句丽侯驺与塞外之高句丽国无关,是玄菟郡高句丽县之侯。此外,王莽更名的“下句丽”不是朱蒙所建的高句丽而是高句丽县。王莽朝记事中的高句丽侯驺,就是当时仍半独立于朱蒙所建之高句丽,且保持与玄菟郡隶属关系的沸流国国王松让或其后人。朴灿奎在《高句丽太祖王宫考》(《东疆学刊》,2000年第4期)中认为,太祖王宫是遂成之父,而不是遂成之兄。太祖王之称,不是起因于新

王朝的建立,而是表明高句丽内新王系的开始。朴灿奎在《高句丽之新大王和故国川王考》(《东疆学刊》,2001年第1期)中认为,根据《三国志》、《后汉书》和《三国史记》的相关记载,可见新大王伯固是次大王遂成的弟弟,在位时间为十五年,高句丽确实存在过故国川王,伊夷谟不是故国川王男武,而是山上王延优。杨军在《高句丽五部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4期)中认为,在高句丽建国之初,五部的部长拥有行政、军事、司法等方面的权力,既是领主,也是中央官。随着对外扩张中高句丽国家机构的完善,五部的部长逐渐演变为地方官,五部也不再强调部族的意义,而是成为行政区划概念。刘子敏在《朱蒙之死新探——兼说高句丽迁都“国内”》(《北方文物》,2002年第4期)认为,中国史书关于高句丽国王“貉”的记载实即朱蒙,死亡时间应在王莽在位之时,在此之前的琉璃王仅是“摄政”而已。朴灿奎在《高句丽之“下户”性质考》(《东疆学刊》,2003年第4期)中认为,自耕农或佃农组成的自由民,而不是奴隶。李大龙在《关于高句丽侯貉的几个问题》(《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5期)中认为,高句丽侯貉是朱蒙所建高句丽政权的国王,当时并不存在两个名为高句丽的政权,《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的记载并没有根本性的错误,相反《三国史记》的记载则是有意篡改了相关记载。李大龙在《关于高句丽早期历史的几个问题》(《东北史地》,2006年第4期)认为,早在东汉时期在我国东北地区就已经存在着东明的建国神话,而这一建国神话是高句丽建国神话形成的主要源头,是高句丽人沿用了该传说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了自己的建国神话。五部由涓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到中部(黄部)、北部(后部)、东部(左部)、南部(前部)、西部(右部)并不是简单的名称的转变,而是有一个漫长的由分散到聚集再到分散的发展过程,同时这一转变也是高句丽民族最终形成的标志。刘炬、季天水在《“高句丽侯貉”考辨》(《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4期)认为,高句丽早期王系是后人炮制出来的。事实上,朱蒙与琉璃王均非高氏王族之祖先,应为同处一代先后称雄于高句丽地区的两个部族的首领。而严尤所

诱斩之“高句丽侯貉”即为朱蒙。王绵厚在《高句丽建国初期的“卒本夫余”与“涓奴”“桂娄”二部王族的兴衰递变——关于高句丽早期历史的若干问题之五》(《东北史地》,2007年第5期)中认为,琉璃明王迁都“国内城”标志“桂娄部”取代了早期“涓奴部”的王权。薛海波在《高句丽早期“那部体制”探析》(《东北史地》,2007年第2期)中认为,高句丽早期“那部体制”是根据鸭绿江流域的地理环境和族群关系而建立的地方一级统治体制。杨军在《高句丽早期五部考》(《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认为,高句丽五部中最早出现的是桂娄部(沸流部)、涓奴部(多勿部),琉璃明王迁都后,才在新都附近组建了其他三部。伊夷谟在位期间高句丽的短暂分裂与五部间的矛盾冲突有关,结果是桂娄、涓奴两部被迁往国内地区,其地位也在下降。王绵厚在《〈汉书·王莽传〉中“高句丽侯貉”其人及其“沸流部”——关于高句丽早期历史文化的若干问题之七》(《东北史地》,2009年第5期)认为,“高句丽侯貉”并非高句丽始祖“朱蒙”,而很可能是《三国史记》中的“沸流部”之“哥(多)勿侯”。李大龙在《由解明之死看高句丽五部的形成与变迁——以桂娄部为中心》(《东北史地》,2009年第3期)中认为,高句丽五部有着从血缘部落落到地域部落的转变的过程。朴灿奎在《沸流国考》(《东北史地》,2009年第6期)中认为,沸流国应是史书中出现的涓奴部,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应是富尔江流域,而不是浑江上游地区。杨军在《高句丽王世系积年考——兼论朱蒙建国时间》(《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9期)中认为,朱蒙所部进入浑江流域大约是公元前126年前后的事情,《三国史记》称朱蒙在位十九年,如果这种说法可信,则朱蒙应去世于公元前107年前后,汉军征服包括浑江流域在内的玄菟郡后来所辖各地是在元封四年(公元前107),朱蒙恰恰于此时去世,可能二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因此他认为,朱蒙很可能是在汉军征服浑江流域时被杀的。

4. 关于高句丽政治的研究

王绵厚在《高句丽的城邑制度与山城》(《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4期)中认为,随着高句丽“五部”制范围的扩大,在高句丽中央王

族以下,“五部褥萨”成为管理五部山城的最高军事和行政长官。杨军在《高句丽中央官职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2001年第4期)中认为,高句丽建国初期不存在正式的中央官制,是以五部官为中央官。随着高句丽王权的加强,五部的部长大权旁落,从地方官中选拔中央官渐成为主要途径,原地方官使者、先人的称号渐演变成成为中央官称号。刘炬在《高句丽相权考》(《北方文物》,2003年第3期)一文中,把高句丽的相权分为左、右辅时代、国相时代、大对卢时代。高福顺在《高句丽官制中的“加”》(《东北史地》,2004年第8期)中认为,“加”字的官职出现于公元3世纪前后,出自夫余语,其意为各邑落的首长或首领,在国家的军政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加”又分“相加”、“古雏加”、“大加”和“小加”。杨军在《高句丽地方官制研究》(《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6期)中认为,2世纪中叶至3世纪末,高句丽逐渐形成自己的地方官系统。在五部控制区以外,高句丽共设六太守,太守下辖城宰,城宰管理城与城周围的村。5世纪以后,在高句丽的地方官制中,城宰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最终形成大城辖小城的四级地方行政机构,其长官分别为:褥萨、处间、可逻达、娄肖,相当于唐朝的三品、四品、五品、六品和七品官。高福顺在《高句丽中央官位等级制度的演变》(《史学集刊》,2006年第5期)中认为,高句丽中央官位等级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汉魏时期7级制、晋隋时期12级制、唐朝时期17级制等三种官位等级的变化。而这一变化又包含有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高句丽中央官位是由五部贵族与非五部贵族两部分官员组成的;第二,高句丽中央官位等级制度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兄为核心的兄系官位体系和以使者为核心的使者系官位体系。祝立业在《从贵族交替执政到泉氏家族专柄国政——试析高句丽后期国内政治局面的形成》(《东北史地》,2007年第6期)中认为,高句丽王国大约在婴阳王时期王权进一步衰落,使得原本贵族交替执政,变成了泉氏家族的独传国政。高福顺在《高句丽官制中的兄与使者》(《北方文物》,2007年第2期)中认为,兄是高句丽王之宗族、五部中之贵族子弟所能担当的官位,使者是高句丽统治域内出

身卑微、非王族及五部贵族子弟中的有才能者或立有军功者所能担当的官位。随着兄与使者这两种官位的发展,在2世纪前后,又逐渐分化出兄系官位群和使者系官位群,并形成了兄系官位体系和使者系官位体系。薛海波在《论公元1世纪至公元5世纪高句丽的“城邑制”》(《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9期)中认为,高句丽中前期“城邑”作为地方一种管理组织方式,先后与“那部体制”及其后的“五部体制”并存。从3世纪末起至4世纪中后期,城邑逐渐成为在其征服地区普遍设置的一种管理方式,军事据点的性质较为明显。公元4世纪后期至5世纪,“城邑制”则随着高句丽领土扩张,在高句丽中央政权的控制下,成为在征服地域中普遍推行的,能够集军事功能、地方统治功能、整合属地民众和物资于一身,在其疆域内居于主导地位的地方管理体制。李乐营在《高句丽政权礼制体制及其在中国古代皇权统治体制内的实践》(《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中认为,高句丽政治层面一直是遵循着中国古代的儒家礼仪制度和规范的,即始终维持着作为一个地方王国(一度是侯国)所应该遵循的礼仪规定。刘炬在《高句丽政治制度的性质、特点及成因》(《东北史地》,2008年第2期)中认为,高句丽政权建立之际,当地并存着中原的君主集权观念和秽貊人的民主观念,这就导致了高句丽政治制度王权与贵族权并存的特点。高句丽政权建立以后一直面临着强大的外部压力,从而养成了该民族善于妥协的习性,这又使得其王权与贵族权并存的现象得以长期并存。高句丽多大山深谷的恶劣环境导致地方政权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而地方政权与中央大贵族的密切关系又加强了贵族权的地位。高福顺在《〈高丽记〉所记高句丽中央官位研究》(《北方文物》,2008年第4期)中认为,《高丽记》揭示高句丽末期高句丽中央官位等级制度时,缺漏了从一品和从四品这两个官位等级,实际上它们存在于高句丽末期高句丽中央官位等级制度中,从一品相当于在高句丽中后期没有政治实权的古雏加、大加。从四品相当于位头大兄,被署置于地方官职中。薛海波在《高句丽后期“城人”与“城体制”略探》(《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9期)中认为,高句丽“城

人”即是高句丽各城中的军士。它是高句丽后期地方行政体制变化和部族化政权体制相作用的必然产物。“城人”是高句丽“城体制”社会结构最基础的组成部分,是高句丽山城防御所倚重的最主要力量。通过部族体制组织起来的“城人”使得高句丽后期的各“城”团聚成了一个难以攻克的军事据点,是“城体制”得以取代五部制成为高句丽后期地方行政体制的主要原因。罗新在《高句丽兄系官制的内亚渊源》(《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中认为,高句丽政治制度除了受中原王朝影响的同时,还存在着与内亚政治文化的传统。恩实在《高句丽“使者”、“皂衣先人”考》(《东北史地》,2011年第5期)中认为,“使者”类似于秦汉时代的“大夫”,是侍从之官。早期主要是随侍君王左右,同时也承担衔命出使的临时事宜。随着王权的发展,使者地位迅速上升,从故国川王开始,由“使者”演化来的名号“大使者”成为“四部”的管理者。到高句丽后期,“使者”名号进一步分化,并由职而阶,发展为“使者系”品位名号序列。至于“皂衣先人”则类似于秦汉时代的“郎官”,是侍卫之官,特别是其政治名号传统之间的某种联系。杨秀祖的《高句丽军队与战争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对高句丽军队士兵构成、武器装备、防御工事、战法以及大小数百次战斗进行了综述,分析了高句丽军队在高句丽政权存在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5. 关于高句丽周边关系的研究

范恩实在《靺鞨与高句丽关系史研究》(《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中认为,靺鞨诸部还没有形成统一政权,因此,在与高句丽的交往问题上也是各自为政,其中粟末靺鞨与高句丽是世仇、黑水靺鞨与高句丽虽不曾友好往来但交恶也少、白山靺鞨则属于高句丽。祝立业在《论南北朝时期高句丽王国的内外政策》(《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2期)中认为,南北朝时期高句丽与周边关系主要是臣贡,北朝保证了辽东地区的稳定,使高句丽得以从容的解决自两晋时因一系列扩张而引发的内部问题。结托南朝又使其能够利用南北对峙的局面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增强保障。南北朝对其共同的册封使其在对周边民族和政权的征

战中拥有了政治上和战略上的优势。统治中心南移后正确的执行了南侵政策,确立了同百济、新罗的战略优势。魏存成在《中原、南方政权对高句丽的管辖册封及高句丽改称高丽时间考》(《史学集刊》,2004年第1期)中认为,高句丽的名称后改称高丽,改称的时间,严格地说,是在5世纪末。李德山在《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形成、嬗变及其原因》(《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4期)中认为,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形成与嬗变,即从开始的怀柔与安抚转变到连续不断的征伐,最主要原因是为了稳定朝鲜半岛局势。姜维公在《南朝与北朝对高句丽政策的比较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4期)中认为,南朝除了招徕一道外,还试图以高句丽牵制北朝,所以册封赏赐很优厚,高句丽有悖意旨之处,南朝多曲原之。北朝把统一全国作为己任,每次高句丽滋事后,北朝都有讨伐之意,但由于种种原因,仍对高句丽实行封册、恩赏、求质、聘妃和责让等政策,这就使得高句丽可以在南北朝之间周旋,左右逢迎。姜维东在《中原王朝对高句丽的封册制度研究》(《东北史地》,2004年第12期)中认为,中原王朝对高句丽的封册绝大多数是随中原地区的分裂、统一而起伏不同的,在高句丽王位新旧交替之际,或在中原王朝王位交替及王朝交替之际通常都有封册活动,用来重新确认彼此的君臣关系。只有少部分是高句丽职责殷勤得到褒奖。薛海波在《试论北燕与高句丽的政治关系》(《东北史地》,2010年第6期)中认为,高句丽杀北燕主冯弘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屈从于北魏的军事政治压力,而是在于冯弘持北燕民众和刘宋的军事政治支持,不肯向其就范,高句丽为了管理数万北燕民众和统治区的稳定只能将其除掉。杨森的《敦煌壁画中的高句丽、新罗、百济人形象》(《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2期)主要介绍了敦煌壁画中存在高句丽、新罗、百济等国人的图像,从而证实大唐与东北亚周边各国各民族的友好关系。

6. 关于高句丽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

刘子敏的《高句丽疆域沿革考辨》(《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4期)主要对高句丽疆域的沿革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考察。高福顺在《试论汉魏时期高句丽政权的统辖区域——以〈三

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记事为中心》(《东疆学刊》,2001年4月)中认为根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记载推断其政权当时统辖区域北占扶余,东伐沃沮,南侵乐浪,至萨水。李健才在《关于高句丽中期都城几个问题的探讨》(《东北史地》,2004年第1期)中认为,公元3年,高句丽迁都到国内,不是迁都到国内城。公元3年以前,在国内即今集安没有古城。今集安国内城下的土城墙,是公元247年在国内即今集安修建的平壤城,其上的石筑城墙是公元342年修筑的国内城。高句丽在公元3年,从纥升骨城迁都到国内以后,直到公元427年迁都到平壤以前的四百二十五年间,在国内即今集安城先后筑有尉那岩城、丸都城、平壤城、国内城。耿铁华在《高句丽迁都国内城及相关问题》(《东北史地》,2004年第1期)中认为,国内城与丸都城均在鸭绿江右岸,即今集安市区及北郊。张福有在《高句丽平壤东黄城考》(《东北史地》,2004年第5期)中认为,高句丽平壤东黄城,不在今之朝鲜平壤东,也不在集安国内城东,而在集安良民高句丽古城——高句丽第一个平壤城之东:今吉林省临江市六道沟镇桦皮甸子。李健才在《再论高句丽迁都到国内以前有无汉代县城的问题》(《东北史地》,2004年第6期)中认为,高句丽政权迁都到国内地区以前,国内地区虽然出土过一些战国、汉代的遗物,这些文物只能说明今集安的历史悠久,中原汉族人民的流入,以及在经济文化方面和中原的密切关系,但该地并不存在汉代县城。刘子敏在《“高句丽县”研究》(《东北史地》,2004年第7期)中认为,高句丽县的地理范围:其西应以长城为界与辽东郡为邻,其东以浑江(古盐难水)为界与西盖马县相接,其南亦以长城为界与辽东郡为邻,西北以浑江上游为界与夫余相接,而东北以今英额布一带为界与上殷台县比邻。张福有在《好太王碑中的“平壤城”考实》(《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4期)中认为,下平壤在鸭绿江左岸,平壤城在鸭绿江右岸。鸭绿江右岸的平壤城不是国内城及其石城内的土城,而是“国之东北大镇”的新城,地处集安良民,为东川王所筑,故国原王增筑。王绵厚在《西汉时期的玄菟郡“曷沟娄”城与高句丽早期“南北二道”的形成——关于高句丽早期

历史文化的若干问题之六》(《东北史地》,2008年5月)中认为,“曷沟娄”城在今苏子河上游和富尔江上游之间的辽宁省新宾县城东约5公里的红升乡白旗堡以西旺清门附近的“白旗堡汉城”。宋娟在《高句丽都城环境初探》(《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7期)中认为,高句丽各个时期的都城环境具有经纬度的相近性、自然环境的相似性、都城附近都有河流和山作为屏障且城附近多有两河流等特点。苗威在《高句丽“平壤城”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2期)中认为,公元313年之前的“平壤城”是上平壤,即今集安市区。此后,尤其是334年故国原王“增筑平壤城”之后的“平壤城”,皆是下平壤,位置为大同江北岸今平壤市区的长安城故址。“南平壤”之说首见于《三国史记》,位置为今长寿山城南的平地城。

7. 高句丽史料整理与研究方面

朴灿奎的《〈三国志·高句丽传〉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一书,主要通过对《三国志·高句丽传》与其他文献记载的比较分析,结合我国近年来取得的新考古发掘成果来进行综合性研究。其中书中考证的主要内容有:王莽朝高句丽记事考、小水貊与梁貊关系考、初期高句丽之五部考、初期高句丽王系考、高句丽之“下户考”。这些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高富顺、姜维公、戚畅的《〈高丽记〉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该书主要是对《奉使高丽记》中的佚文、脱文、讹夺等问题进行逐一考订,并对佚文中涉及的高句丽官职、高句丽地名、高句丽五部、高句丽社会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姜维东、郑春颖、高娜整理的《正史高句丽传校注》(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一书,主要以正史中的高句丽传为主,采以集注的方式,并汲取近现代考古资料以及参考专家学者的观点。在体例上最先标明史源,然后史事集注,最后再注人名、地名。按语、考古资料则选择适当处安排。刘子敏和苗威编著的《中国正史〈高句丽传〉详注及研究》(香港亚洲出版社,2006年)一书,主要将每一部正史的《高句丽传》作为一个专题进行介绍与研究,该书分别介绍了作者的情况、文本提示、原文与注释、文献辨析、问题研究。李大龙的《〈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

士学位论文)选取《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作为研究对象,比较《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与中国史书的渊源关系,二者在记事上存在的差异、差异形成的原因,以及对个别问题进行辨正。

8. 关于“高句丽”名称方面的研究

王绵厚在《高句丽古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年)中认为,“高句丽”三字的意义为“双足驰行于高山曲谷”之民族。杨军在《高句丽名义考》(《东北史地》,2004年第5期)中认为,高句丽一词作为族名,并不出自汉语,因此不能从汉语的字义出发来理解高句丽一词的意义。高句丽之名并不始于朱蒙所部,而是来自汉四郡设立以前就居住在该地的高句丽族。早于朱蒙所部的高句丽是貉系民族的一支。高句丽就是“貉”这一族称的一种音译。

9. 关于高句丽宗教、文化、社会方面的研究

2004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位于我国吉林省集安市和辽宁省桓仁县的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高句丽文化研究。张碧波在《高句丽原始宗教文化论略》(《黑龙江民族丛刊》,2000年第2期)中认为,高句丽的原始宗教文化接受了中华上古三代文化的影响,又在本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具有民族特点的新质文化,从而使高句丽的原始宗教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影响着高句丽的整个历史进程。杨军在《也谈高句丽柳花神话》(《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1期)中认为,高句丽始祖起源传说的原型即夫余人的始祖传说,是对往古史事的层层神化,河伯女柳花约原型为橐离侍儿,高句丽始祖起源传说不是同类传说中最早产生的。这说明以柳花为东北亚共祖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李殿福在《高句丽古墓壁画反映高句丽社会生活习俗的研究》(《北方文物》2001年,第3期)中认为,高句丽所崇拜的神灵,除了本民族所固有的以外,大多数取源于中原的神话传说,如四神、伏羲女娲、神农氏、驾鹤仙人王子乔以及对日月神的描绘,说明古往今来,民族文化的交往是对等的,是互为影响的。梁志龙在《高句丽隧神考》(《北方文物》,2001年第4期)中认为,高句丽隧神本称秽神,后称夫余神,皆因族名而得。隧

神原为传说中的女性始祖,亦即原始宗教中的社神,祭社水边,因而转作河伯,隧神与中原神话传说中的女娲共点甚多,两者当一。由于历史发展的层层相累,造成了该神的多名多职多能。孙进已在《高句丽的起源及前高句丽文化的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2期)中认为,前高句丽文化是由夫余文化、夷文化、汉文化三种文化组成。李乐营在《高句丽自然宗教信仰对象辨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2期)中认为,高句丽的崇拜对象主要为天神类崇拜、地祇类崇拜、人祖类崇拜等方面,高句丽自然宗教信仰虽然具有一定特点,但却是源出于中原,变系于中原,高句丽人精神世界浸透着的是中华文化的基本成分。张碧波在《高句丽壁画墓四神图像与中国的天文学、神话学》(《北方文物》,2005年第1期)中认为,四神图像的文化渊源于中华古老的天文学与神话学,其壁画属于中国古老神话的综合体,四神图像的文化功能在于护送亡者升天。在西汉壁画墓与高句丽壁画墓的比较中揭示出二者属于一个共同的历史文化体系。耿铁华在《高句丽神话解析》(《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中认为,高句丽建国神话皆源于商周神话,属于中华神话的组成部分。孙颢在《高句丽的祭祀》(《东北史地》,2007年第4期)中将高句丽祭祀分为:祭隧神和祭天、祭社稷和灵星、祭日神、祭其他祖先四类。耿铁华在《高句丽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形成与影响》(《古代文明》,2007年第4期)中认为,高句丽民族及其政权长期生活在汉玄菟郡、乐浪郡、辽东郡的广大地区,接受汉晋以来中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影响。他们由最初信奉儒教,逐渐接受佛教、道教,在高句丽后期形成了“三教合一”的宗教思想格局。随着高句丽统治中心的南移,高句丽的影响也扩大到新罗和百济,使三教合一的宗教思想在朝鲜半岛深入传播,并产生了重要影响。郑京日的《高句丽“弓矢文化”初论——以建国神话和古墓壁画中的弓矢图为中心》(延边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以高句丽建国神话与古墓壁画中的“弓矢图”为线索,通过分析高句丽人对“弓矢”的崇尚,剖析了弓箭在高句丽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李淑英、李乐营在《高句丽民族礼仪

初探》(《东北史地》,2008年第1期)中对高句丽的嘉礼、凶礼、吉礼中的某些礼仪作以整理。李乐营在《高句丽佛教礼拜对象辨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2期)中认为,高句丽的佛教信仰是全面和多元的,既存在着对佛祖释迦牟尼的信仰,还有对贤劫千佛、阿弥陀佛、弥勒佛、菩萨等的崇拜和信奉。张碧波在《高句丽萨满文化研究》(《满语研究》,2008年第1期)中认为,终高句丽之世,巫史文化在高句丽的社会生活、历史进程中一直发挥作用,这种巫史文化正是萨满文化在高句丽国家史与民族史中的遗留,并顽强地保持它的生命力。姜维东在《高句丽黄龙升天传说》(《东北史地》,2008年第6期)中认为,高句丽的黄龙升天传说完全是受内地传说的影响,而且是受黄帝升天传说和徐偃王升天传说影响最大。李乐营在《高句丽宗教信仰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中系统地探究了高句丽民族的精神世界,包括高句丽原始宗教信仰对象的渊源和流变和佛教、道教在高句丽的传入与发展。姜维东在《高句丽卵生传说研究》(《东北史地》,2009年第3期)中认为,高句丽卵生传说不是继承夫余的“吞卵传说”,而是在接受内地相类传说的多重内容的情况层累演化而成的。而古代东北亚地区“淫风”的盛行则助长了这种传说在当地的流行与演化,使“卵生传说”成为东北亚地区内容变化非常多的母题传说。姜维东在《高句丽神马传说》(《东北史地》,2009年第4期)中认为,在高句丽诸多传说中,神马传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个例。这种神马的原型果下马最初并非高句丽所有,而随着果下马产地并入高句丽,这种神马传说也与高句丽始祖联系起来。张碧波在《感日卵生——高句丽族源神话——兼及〈东明王篇〉的解析》(《东北史地》,2010年第4期)中认为,卵生族源神话开国之君朱蒙,其母为河伯女郎,自认“河伯外孙”,这说明高句丽以及夫余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亲缘关系。苗威的《高句丽移民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一书,综合分析了高句丽王国从建立到灭亡期间的移民运动,并把这一历史事件放在整个东北亚世界大的背景中去考察和梳理。

10. 高句丽好太王碑方面的研究

朴真爽的《好太王碑拓本研究》(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1年)一书由拓本篇、资料篇、论文篇组成,并收录了好太王碑拓本60多幅以及中外学者释文29种。耿铁华的《好太王碑拓本收藏著录及其年代》(《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1期)主要对目前高句丽好太王碑文拓本进行了详细介绍。耿铁华编著的《好太王碑一千五百八十年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一书,论述了以下问题:好太王碑碑石的现状和保护问题,好太王碑的捶拓、拓本和石灰抹问题,碑文现状与释读,与好太王碑有关的冉牟墓志研究状况以及晚于好太王时代的中原高丽研究状况。作者采用实证的研究方法,在充分利用好太王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张福有的《好太王碑杂识及碑文考笺》(《学问》,2003年第1期)主要就好太王碑的立碑时间、好太王碑被重新发现的时间、好太王碑的拓本、好太王碑的释读和集解等诸多方面进行了介绍。张福有等编著的《好太王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12月)一书以北京大学藏好太王拓本C为蓝本影印出版,制作精美,并辅以研究资料,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方起东在《好太王碑释读一见》(《东北史地》,2004年第2期)中认为,释读好太王碑首先要摒弃双勾加墨本,寻访、选定一批1903年-1904年好太王碑被抹上白灰之前的精良拓本开展比较研究。其次,深入第一现场,贴近好太王碑,直接对碑面文字开展逐字逐笔的分辨。最后对好太王碑上的异体字开展综合的、深入的、全方位的认真研究。徐德源在《好太王碑铭文三个地名今址考析》(《东北史地》,2004年第3期)中认为,好太王碑刻文中曾出现“来口城”、“弥邹城”、“大山韩城”等地名,参照文献并结合今天的地理区划,将“来口城”考证为“来远城”(今辽宁凤城县界),将“弥邹城”推断为今韩国京钱道仁川,将“大山韩城”推断为今韩国忠清南道鸿山。徐建新的《高句丽好太王碑早期墨本的新发现——对1884年潘祖荫藏本的初步调查》(《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耿铁华的《潘祖荫藏好太王碑早期拓本刍议》(《东北史地》,2006年第4期)主要介绍了目前发现的好太王碑最早的双勾加墨本——潘祖荫藏好太王碑拓本。耿铁华

在《好太王碑释文补字略说》(《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8 年第 9 期)中认为,荣禧、金毓黻、杨伯馨对碑文缺损部分进行了补释文字应该是有所本的,那就是元丹山的拓本和王志修的诗文。耿铁华的《李云从与好太王碑捶拓》(《东北史地》,2008 年第 4 期)主要论述了李云从在好太王早期捶拓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认为李云从的拓本是年代准确的早期好太王碑的精拓本。徐德源的《好太王碑铭文选释选考》(《辽宁大学学报》,2008 年第 1 期)主要对好太王碑铭文用城数断句的方法判读漫漶字迹,新释读出韩氏利城、沸城两个城名,考定“鸭卢”为用汉字标记日本语音“野郎”,从而判定带“鸭卢”后缀的五个词语是日本人名。考定好太王六年丙申征讨百济之进军为“军至界首”。徐建新的《高句丽好太王碑拓本的分期与编年方法》(《古代文明》,2009 年第 1 期)主要对数十种传世的好太王碑拓本进行分期与编年。李德山在《再论好太王碑之“倭”》(《社会科学战线》,2011 年第 5 期)中认为,好太王碑文中的“倭”之实体,既不是军队,也不是海盗,而是一批批的迁徙者,他们是在日本列岛发生动乱和兼并战争的特殊背景下,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失败者。为了寻求新的生存空间,不得不向朝鲜半岛移民。耿铁华的《好太王碑辛卯年条与相关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11 年第 11 期)重新梳理与考证了好太王碑辛卯年条的系列问题。

11. 高句丽考古方面的专著

王禹浪、王宏北主编的《高句丽、渤海古城址研究汇编》(哈尔滨出版社,1991 年版,2007 年重印)一书,是一部最早全面介绍高句丽、渤海古城资料汇编,该书把作者多年来的研究成果集中于一体。许多中外致力于高句丽与渤海史研究者都将此书视为研究高句丽渤海城市历史的工具书。全书分为高句丽、渤海古城概述及上、下二编,附图、表四个部分。高句丽、渤海古城概述是作者的研究成果。作者在多年来实地踏查的基础上,结合文献分别对高句丽、渤海古城的分布与地理环境、古城的形制特点、建筑结构及出土文物等方面做了系统的研究和梳理,具有原创性的价值。上编为高句丽古城专辑,共收录高句丽古城 190 座。其中我国境内

吉林省 80 座,辽宁省 90 座。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境内 20 座。此外,附有高句丽古城址研究文章 32 篇。该书从筑城特点的角度细心比较了高句丽与渤海筑城文化的区别,并利用大量例证分析了黑龙江省南部渤海山城所受到的高句丽文化的影响,突破了以往学术界一直回避渤海考古文化中的高句丽因素这一束缚,进一步认清了高句丽文化对渤海王国文化尤其是筑城文化所给与的影响。魏存成的《高句丽遗迹》(文物出版社,2002 年 6 月)一书全面总结了 20 世纪高句丽遗迹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并对其都城、山城、墓葬等重点遗迹及遗物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具有较重要的学术价值。王绵厚的《高句丽古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 年)一书及以下各章,除了分别立题的高句丽民族的起源及其考古学文化、高句丽的城邑制度与都城、高句丽古城的建置分期分区、高句丽古城的建筑特点及出土文物断代分析、高句丽古城命名的文化内涵,以及对与高句丽古城相关的重要人文史迹的考察外,还就高句丽古城形成演变与其社会发展的关系而一论,从理论上拟宏观归纳为以下几方面:第一,从青铜时代的早期“聚落”、“环山围壕”,过渡到早期山城,是夫余、高句丽“邑落”制发展的主要形式;第二,高句丽“城邑制度”的核心,是以山城为主要特征的城邦奴隶制;第三,源于商代“五方土”之制的早期“五部制”,是高句丽山城布局的基础;第四,军事防御体系,是高句丽山城的主要实用功能;第五,“比郡县”是高句丽后期接受汉文化后,城邑制度和山城发展的总趋势。郑永振编著的《高句丽渤海靺鞨墓葬比较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2003 年)一书以考古学视角,从比较研究方法入手综合分析了高句丽、渤海、靺鞨的墓葬文化,认为渤海文化是具有多元的复合型文化。吉林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编著,傅佳欣主编的《集安高句丽王陵》(文物出版社,2004 年)一书,主要介绍了集安 13 座王陵的墓葬形式、相关遗迹、遗物。吉林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编著,宋玉彬主编的《国内城》(文物出版社,2004 年)总结了 2000 年、2001 年、2003 年在集安国内城与民主遗址的考古资料。吉林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编著,金旭东主编的《丸都山城》

(文物出版社,2004年)主要总结了2001年-2003年对丸都山城的全面测绘、调查和试掘,获取了大量详实、科学的数据和一批珍贵的文物。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李新全主编《五女山城》(文物出版社,2004年),该报告是五女山城1996年-1999年、2003年调查与发掘情况的汇总,主要为山城形制、布局、城墙、城门、城内遗迹。张福有、孙仁杰、迟勇编著的《高句丽王陵通考》、《高句丽王陵统鉴》、《集安高句丽墓葬》(香港亚洲出版,2007年)报告从解读高句丽王陵所在地的地名入手,全面调查、补充了大量的新的的重要资料,按墓葬形制、结构、出土器物、相关遗迹等确认高句丽王陵的考古编年和分期,将文献记载与墓葬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系统加以研究,科学分类比对,在国内外以往考古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第一次全面考定高句丽王陵的墓主人,取得一系列新的突破和进展。耿铁华的《高句丽古墓壁画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一书全面总结了高句丽古墓壁画的调查研究和发掘结果,全面论述了国内外高句丽古墓的分布与现状,并总结了中国、朝鲜、韩国、日本的研究历程。此外,还对古墓壁画的分期以及与文献相结合深入高句丽社会生活进行综合研究。可以说,这是高句丽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王禹浪、王文轶编著的《辽东半岛地区的高句丽山城》(哈尔滨出版社,2008年)一书共分三章,第一章主要介绍了辽东半岛的地理位置、地貌特征、高句丽经略辽东的历史情况,辽东半岛高句丽山城的分布情况;第二章是辽东半岛高句丽山城的述略,并以城址的周长为编排体例,并附有第一手的考察报告;第三章主要将高句丽经略辽东半岛地区史料辑要,以便于查考。该书对辽东这一特定区域的高句丽山城进行全面的研究,无论在体例上还是角度上都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创新之作。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吉林集安高句丽墓葬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全书共收集已经发表的调查、发掘报告35篇,动物骨骼鉴定报告1篇。内容上可分为两大类:壁画墓方面,五盔坟四、五号,长川一、二号,麻线一号等墓的报告,对于墓葬形制和壁画内容著录详细,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相当大的便利,积石墓方面,以上活龙、下活龙、东大坡和

集锡公路几次发掘规模较大,其复杂多变的墓葬形制及丰富多彩的出土遗物,在报告中也颇为详尽,至今仍然是高句丽石墓研究的基础。此外,报告集中还收录了一些形制特殊的墓葬和近年调查的一些可能的高句丽王陵。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院编著的《集安出土高句丽文物集粹》(科学出版社,2010年)一书主要介绍了一百三十余年来,在集安境内通过征集、采集、发掘等渠道陆续获取的高句丽时期遗物以图录的形式呈现给社会。目的有二:其一,为学术界深入开展学术研究搭建更加夯实的基础平台;其二,为普通民众真切感知高句丽时期的生产力发展状态、高句丽文化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开阔视野。朴灿奎、郑京日的《玉桃里——朝鲜南浦市龙岗郡玉桃里一带历史遗迹》(香港亚洲出版社,2011年)一书主要汇报了2010年5月20日至6月24日,延边大学与朝鲜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共同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浦市龙岗郡玉桃里一带历史遗迹进行了调查发掘,清理了包括玉桃里高句丽壁画墓在内的26座封土石室墓和1座石棺墓,并踏查了高句丽时期的黄龙山城,同时又在石泉山瓦洞清理了2座石棚,为国内外学术界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考古调查资料。

12. 综合性高句丽专著的介绍

马大正等编著的《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论丛》(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一书分为三篇:民族篇、政治篇、研究篇。民族篇由高句丽名称(族称、县名、国号)的出现、含义、演变及消失,高句丽称号的异写(高句丽、高句骊)、简称(句丽、高句丽非句丽一部、高丽)和出现的时间,高句丽族的族源(主源、非秽貊族系融入者),高句丽国灭亡(高句丽国灭亡与湍江以北地区与居民归属)和高句丽人的去向,高句丽社会的经济、阶级和五部组织,高句丽与周边诸族的关系(夫余人地位的变化、肃慎系的战争与臣属、东胡系的争战交往、与百济在汉江一带的争夺、与新罗人的和与战),两个高丽的差别(立国时间的悬殊及不同的历史发展走向,各自的统辖区域、互异的族属以及族源的非前后相承),高氏高丽与王氏高丽无前后相承关系的辨识等八个方面组成。政治篇是由高句丽国

的建立与发展、高句丽与两汉至南北朝中央王朝的关系、高句丽和隋王朝的关系、高句丽与唐王朝臣属关系的建立和发展、高句丽与历代中央五朝关系的性质等五个问题构成。研究篇是由中国学者对高句丽历史研究的评述;朝鲜半岛学者对高句丽历史研究评述;近百年来日本学界的高句丽历史研究概况三个大方面组成的。该书以宏大的视角,全方位地论述了古代高句丽国家的方方面面,并总结了国内以及朝日韩以往研究的动态与信息。因此,该书在高句丽史领域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耿铁华的《中国高句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由绪论、高句丽早期历史、高句丽建国、两汉时期的高句丽、魏晋时期的高句丽、南北朝时期的高句丽、隋唐时期的高句丽、高句丽政权建设、高句丽经济、高句丽都城和山城、高句丽与新罗等国的关系、高句丽文化等十二章构成。全书共有十二章四十节,第一章绪论,就研究对象分期、研究现状以及研究资料等基础性问题做了综合论述,问题清楚,任务明确。第二章高句丽早期历史就民族起源、民族形成与发展、早期文化等民族史诸问题进行论述,综合考古学与文献学资料,有根据地论证了高句丽民族为中华古族,并提出“高句丽起源于商人”的一家之说。第三章至第七章为高句丽国家史,论述了高句丽民族建国、巩固、扩张发展壮大直至灭亡的完整的历史进程。其中对建国传说及其汉文化本体、政权建立年代的考察、政权性质与特色、王系继统法制研究、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革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以及国势衰落、与隋唐的战争、灭亡的原因等诸问题的考察,其中既有作者对学界成果的选择与吸收,更有作者的真知卓见和对问题的新发现、新观点。第八章是政权建设史,其中对“高句丽封建社会的特殊性”的研究论述最具功力。经过对史料的分析与比较考察,作者认为“高句丽封建社会的特殊性在于汉代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下,一下子从原始时代进入了封建社会”,正基于此,作者提出高句丽国家长期保留某些原始氏族生活文化特点之所在。这正抓住了古代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特点,对东北古族古国具有启示性的研究。第九章对社会经济研究;第十章对都城与山城研究;第十一

章是外交关系研究;第十二章为文化研究。本书构建了完整的高句丽国史体系,既注重国家史的纵向发展,也注重高句丽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横向揭示。纵横交错,构成一幅高句丽社会生活的主体图景,使史学研究达到一个新的境界。^[1]

马大正等编著的《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续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该书是在《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基础上对高句丽历史进一步深化研究的著作,分为理论篇、历史篇、研究篇,依次探讨了高句丽政权的历史归属问题、汉四郡的地望、古代中国政权对高句丽政策、高句丽对古代中国政权的政策、高句丽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高句丽活动地域变迁,句丽为高句丽简称、高句丽五部的形成和发展等问题,并对高句丽考古研究、高句丽归属问题研究、朝鲜和韩国高句丽研究、我国史书记载中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评议。

王绵厚的《高句丽与濊貊研究》(哈尔滨出版社,2000年6月),该书从内容上可以分三大类:其一,以高句丽和濊貊族系的起源为主,对中国东北环黄、渤海北岸和“长白山区系”古民族的早期历史及其考古学文化的探讨,共有八篇文章。主要从古文献、考古文化和民族地理等方面,对国内外素有争议的高句丽、濊貊的起源问题,进一步进行探讨;其二,以高句丽的城邑制度、古城研究与民族疆域地理为重点,以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和民族文化史的整合上,探讨高句丽、濊貊、夫余等古民族的政权结构、疆域形成和相关城市考古学;其三,以高句丽与濊貊等东北古族的历史文化研究,主要是考古文化研究为重点,将这一“东夷(东北夷)”文明与民族形成、演变的历史投放到中国东北和东北亚更大的民族文化中去考察。并以中国东北“辽河文明”和“长白山区系文化”大地域文化为依托,在更广阔的历史时空中,探索高句丽、濊貊等东北古民族文化在构架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特别是北方文化)中的历史地位。

杨军的《高句丽民族与国家的形成和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该书由上下两篇组成,上篇包括七章,即与高句丽民族居地相关的地域概念、高句丽民族居地的原住民、前高句丽时期的民族融合(上)——中原移民

的影响、前高句丽时期的民族融合(下)——蒙古草原移民的影响、朱蒙所部迁入前的汉四郡民族格局、高句丽民族属溯源、高句丽民族的形成与演变;下篇包括六章,即前高句丽时期政治组织形式的演变、郡县制对高句丽民族居地的影响、高句丽五部的演变、高句丽中央官制的演变、高句丽地方统治结构的演变、高句丽国家的演变。从高句丽民族的形成演变与高句丽国家的形成演变两个层面谋篇布局,结构组织严谨,论证逻辑严密,在很多方面取得了科学的新见解和新结论。^[2]

三、回顾与展望

综上所述,近十年中国高句丽的研究成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和难点也日趋多元化。一方面,这一现象与“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简称“东北工程”)的开展及中国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功申报,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随着韩国对于我国“东北工程”理解上出现的偏差,以及韩国民间学术团体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的推动下,有关高句丽问题开始在媒体和社会中发酵升温。总之,在上述历史背景的影响下,高句丽历史问题的研究在学术界和国际社会中都出现了关注的热潮。

概括起来看,我国近十年来的高句丽问题研究大致有如下几点特征:其一,在高句丽的族源与高句丽的起源问题上存在着争议,这一争议从原来的单纯的历史文献学考证,开始转向结合考古发现来探讨高句丽的族源及其源流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文献与考古发现的结合,既增加了如何正确的解读考古学资料的难度,也对历史文献的考证提出了新的问题。其二,在研究高句丽政权的归属及其政权的性质问题上则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一些学者依然坚持高句丽政权是隶属于中原王朝的中国东北的地方政权;另外一些学者则提出高句丽政权在从集安市迁往朝鲜半岛北部的大同江流域后,其政权的性质和归属则具有两重性,既属于中原王朝所辖的地方王国政权,也承认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这些学者通常使用“一史两用”的观点。其三,高句丽考古学的成果十分丰富,利用考古学文化重新认识高句丽的社会生活、

解释其高度发达的都市文明及其民族文化则成为这一领域研究的重要走向。其四,在高句丽历史与民族文化研究方向上呈现出多元化和复杂化。中国学者正在试图突破以往的研究束缚,并尝试着利用新的理论来构建对高句丽问题研究的新的探讨。其五,在对高句丽的疆域、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高句丽灭国后的民族去向,以及与朝鲜半岛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也出现了新的研究动向和更加理智、客观的解释。其六,中国学术界目前对高句丽的史料和文献的重新梳理与考订工作也得到了加强。十年来,学术界对于中国正史中的《高句丽传》,以及朝鲜半岛的历史文献,诸如《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等都进行了标点、注释、考证、订正、整理和研究也做了大量工作,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下面是笔者对未来中国高句丽展望的几点思考:

其一,近十年来,我国高句丽历史与民族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些成果并不意味着和代表着永恒的丰硕。我们的高句丽问题的研究最令人担忧的是研究机构的分散和研究人员的匮乏和断档,如何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则是我们今后高句丽问题研究中的首要工作。当然,这涉及到大学的学科建设、科研事业单位的重视以及政府的支持。

其二,在高句丽历史与民族问题研究方面,我们尚缺乏利用新的理论来指导这一领域的研究。传统的民族理论和黄河、长江中心说的中国历史发端的“一元论”,以及强势的民族理论等都是我们需要创新和突破的重点。例如:我们是否需要在“新史学”^②方法和理论方面有所突破呢?虽然在国内史学界对“新史学”的态度褒贬不一,但是无可否认的是“新史学”对于我们重新构造历史框架以及对于多学科的交叉方面的把握有着方法和技术上的帮助。尤其是在历史学与考古学之间有机的结合,“新史学”往往起到一种润滑剂的作用,“新史学并不仅仅关注那些具有王宫王陵的重大遗址、遗迹和遗物,而更加关注那些十分普通的涉及大众日常生活的遗址、遗迹和遗物,如普通房屋和居住场所及其内部的布置、古代城市区域的组织、古代的商道、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文物,甚至通过

航空材料技术获得的中世纪农业和城市史的数据资料,等等。这些资料已经被新史学家们广泛运用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研究当中”。^[3]因此,笔者认为,用“新史学”的方法虽然未必是中国高句丽史学今后的研究必经之路,但是对我们研究视角的转换以及历史思维空间的扩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其三,对于如何处理好我国边疆地区跨境民族和历史,以及古代民族政权及其疆域与当代民族国家之间的领地存在着跨境问题时,在学术研究领域应该运用怎样的理论与观点进行实事求是的解释,理智而妥善地处理好学术与国家利益,乃至国家史、区域史、民族史的关系,在不失外交之原则的前提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达成共识和历史认同,则是我们高句丽历史今后的研究中最为复杂而颇费脑筋的问题,构建一种上述的理论体系则是我们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其四,加强与东北亚各国在高句丽历史与民族问题方面的学术交流,则是非常必要的。在中国高句丽研究方面应该建立沟通国内外信

息的情报中心,及时而准确地把东北亚各国,尤其是韩国、朝鲜、日本等国对高句丽历史、民族与文化的研究成果及时翻译和整理,并创建《高句丽研究通讯》,与东北亚各国建立广泛的交流关系,共同促进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的深入研究。

注释:

①本节所列的,只是挑选部分有代表性的文章与专著,并非全部。

②新史学(New history)指20世纪初开始萌动、50-60年代空前发展旨在反对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的史学新潮流,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提倡广阔开拓史学研究领域,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分支合作,强调史学家解释,重视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即史学功能等。

[参 考 文 献]

- [1]张碧波.中国高句丽史研究的新收获——评《中国高句丽史》[J].东北史地,2004(2).
- [2]高福顺.逐本溯源考实求真——《高句丽民族与国家的形成和演变》评介[J].东北史地,2007(2).
- [3]徐善伟.当代西方新史学与“史料之革命”——兼论中国新史学史料体系的重构[J].史学理论研究,2010(2).

责任编辑:李新红

Major Research Achievements on Goguryeo History in China(2000 - 2012)

WANG Yu-lang ,CHENG Gong ,LIU Jia-ming ,GUO Cong-cong
(Dalian University ,Dalian 116622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about the nation and history of Goguryeo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China for long time ,with abundant achievements ,especially in the latest decade. The culture heritage and history issues are widely concerned ,and thus there are more research institutions ,experts and theories lately. A thorough literature review will help to know what has been done and what still needs to be done.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are reviewed based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research perspectives in the latest decade ,based on which the achievement made in China as well as inadequacy is discussed.

Key words: in the latest decade; research on Goguryeo in China; summary of the results